

## 基督教在川康民族地区的医疗传教活动 (1939—1949)\*

邓 杰

---

提 要：教会人士认为，传教事业与医疗事业并行不悖，互为依存。基督教在华医疗传教事业于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变迁过程，并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基督教医疗传教习惯的影响，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边疆服务活动中，将医疗卫生当作在边民中传教的重要手段，并在服务边民的事工中加以广泛应用。医疗传教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邓杰，女，历史学博士，四川文理学院副教授。

主题词：基督教 边疆服务 川康地区 医疗传教

---

基督教在华医疗传教事业是近代基督教传教事业的重要部分，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变迁过程，并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sup>①</sup>。教会人士认为，传教事业与医疗事业并行不悖，互为依存。早在基督教创立之初，耶稣就曾通过向人治病来传教，并教其门徒利用给人治病的机会传教<sup>②</sup>。这一传统，为基督信徒继承。海珥玛认为：“主教工作人员与医务人员相仿，都更加觉得身、心、灵三方面是互相依赖的。身体上的痛苦影响了心与灵，一个人的心灵精神的情况如何，亦会使他的身体起感应。”<sup>③</sup>医疗卫生“作为一种福利机构为社会提供服务”，既可以体现宗教的宗旨，又能引起人们对基督教的好感，故此，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成了基督教的重要传教方式。

既有研究表明，基督教之所以利用医学进行传教，适应中国社会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清政府禁教、限教的宗教政策下，医疗传教成为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的可行性方式<sup>④</sup>。早期来华的传教医生利用西医西药优势行医治病，使一部分国人对西医及与之联系的基督教的态度逐渐改变，从怀疑到接受乃至认同。

进入20世纪之后，在华传教士更加注重发展医疗事业，除扩大原有的医院规模外，又在各地新设了不少医院和诊所。据1938年出版的《基督教差会世界统计》，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共有300所，病床位数共约21,000张，另

有小型诊所约600处<sup>⑤</sup>。可见，基督教差会将医疗事业作为在华扩大影响的重要措施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川康边地的基督宗教活动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相关。受基督教医疗传教传统的影响，该会在川康边地的服务活动中，也将医疗卫生当作在边民中传教的重要手段，并在服务边民的事工中加以广泛应用。

### 一、川康边地的宗教环境与医疗布道目标的确立

贺夫曼（Melchior Hoffman）说：“医药传教的目的，在于使人民看到医治疾病，有比较他们古老而迷信的办法更好的方法，使他们改正对于疾病与生活的错误观念与态度。”边疆服务在川西区、西康区的服务过程中，将传教活动与医药事业联系起来，力图使边地民众在接纳医药的同时也信仰耶稣基督，所欲实现的正是贺氏强调的“基督教乡村医药卫生工作的目的”<sup>⑥</sup>。而医疗卫生工作的目的与当地的宗教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关联，首先来考察一下边疆服务各服务区的宗教环境。

川西区主要居住羌、戎、汉等族，“语言宗教各不相同，风俗习惯亦多差异”<sup>⑦</sup>。羌族社会并没有同一或相对集中的宗教信仰，羌民信仰尚处于多神崇拜阶段，信仰对象包括原始图腾、巫教、道教与佛教等等，宗教领袖为端公，同时请各教的宗教师来替他们解决困难<sup>⑧</sup>。嘉戎族的信

仰状况与羌族有异,宗教势力较为强大,“一般社会组织、政治机构、经济权衡、家务琐事,都以宗教为其唯一不移的中心”。嘉戎人“笃奉喇嘛教,家留一子承祧,余均出家喇嘛寺院”,全家以此为荣,对于寺院布施也极为慷慨<sup>⑨</sup>。喇嘛既是当地的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边民遇有婚丧大故等事,必先请教喇嘛,“凭其一言决定,奉行惟谨,因此人皆喜学喇嘛”<sup>⑩</sup>。

西康区的宗教环境也大抵如此。曾经两度穿越大凉山调查研究彝族谱系和宗教情形的民族研究学者陈宗文发现,彝民“虽深怕鬼神,而宗教色彩极为淡漠,精神无所寄托”,“只有向烟和酒纠缠”,所以彝民酗酒、抽鸦片烟的现象极为普遍<sup>⑪</sup>。边疆服务部工作人员李应三在边地工作有年,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彝人“唯一宗教领袖为‘笔母’,凡疾病疑难,问卜吉凶,皆由‘笔母’主持,”并无忠一的宗教生活<sup>⑫</sup>。

川西区 and 西康区的上述宗教情形,使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认为在该地区开展传教工作很有必要性和可能性。1930年代末,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川康边境展开了边疆服务运动,还专设有边疆服务部作为其组织指挥机构。在这系列服务活动中,尤以医疗传教活动的开展最有声色。

对于医疗传教,边疆服务人员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传教与医务事工的关系上,边疆服务部认为:“宗教工作是服务边胞的方式之一,是一种达到改善边胞生活之手段,而并非服务之目的。”“宗教工作人员同时兼负……卫生及其他之服务”<sup>⑬</sup>,应把宗教、卫生等服务工作看作是一个整体。总会总干事崔锡章也认为,边疆服务部传教与医疗工作“虽然性质不同,然而目的却是一个,正如四肢百体,各有专责而必须互相联络一样,联络得合适,方能处处方便。……唯有大家意志集中,分工合作则各项事工方能顺利推动,服务目的方能可斯达到”<sup>⑭</sup>。此语较好地阐释了边疆服务部宗教事工与医疗事工之间的关系,即边疆服务部工作是“以宗教立场为出发点,而为边民服务。”而这一立场为“(基督教)宣教事业找着了个前程远大的出路”<sup>⑮</sup>。

边疆服务部主任张伯怀1943年在工作会上的一段讲话,对宗教工作与边疆服务部其他各项服务工作的关系作了最为明确的阐释:

本部是以宗教的精神从事服务的工作,我们的宗教是否高尚,信仰是否纯正,要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表现出来,我们不以福

音为耻,在适当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愿宣传宗教,传布基督,我们自己认为是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分给别人,所谓“君子耻独为君子”也。但是我们不是宗教的侵略,并不必攻击别人的信仰,或免(勉)强别人接受我们的信仰,只是用人格的感化与生活的影响为凭藉,在地方人民不欢迎的区域,我们可以根本不传教,我们的口号是“为服务而传教”,不是“为传教而服务”<sup>⑯</sup>。

医疗传教在边疆服务部服务边民的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一直将医药事工当作其发展传教事业的重要策略。1948年10月18日至27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届总议会在苏州召开。在此次会议上,总会强调“教会应提倡服务工作,扶助救济贫苦教友”。这次会议通过了总会“今后发展医药事工策略案”。其中包括:第一,强调“为工作效率及节省费用起见,应多创设或择优先设中心医院”。因为“中心医院可以把人才经济集中在整个计划下,均匀分配”,“通常在一个中心医院之下,得附设公共卫生,乡村诊所,其服务……于实施公共、个人、家庭、妇孺、卫生工作时,兼事宣传福音”。第二,除了中心医院之外,还应设立小型诊所。诊所除“须有经常的医药人员及护士”和“由中心医院派遣医师定期施诊”外,最好还应“有个女传教员协力同工,建设基督化的健康家庭”。第三,“发展乡村医药工作,实为本会首要急务”。担任这些任务的人员,“除了曾受高深医药技术上的造就外,须有基督的精神”,应把乡村医药工作当成“无上的光荣”。并且,“教会设立之医院内,应该有受过相当训练之牧师及其传道工作”<sup>⑰</sup>。由此可见,总会一直都把发展医药与传播基督教福音相结合。总会的这一策略,为边疆服务部发展医药事工奠定了基调:即以医药为开路先锋,博得边胞的亲近与好感,相机劝其入教。

川西区、西康区的宗教环境及边疆服务部对宗教活动与医疗服务关系的上述认识,为中华基督教更好地在当地展开医疗传教活动奠定了基础。

## 二、传教工作的开展及医疗传教的方式

基于对医疗卫生事业与宗教关系的认知,边疆服务部在积极开展各方面的服务工作的同时,异常重视医疗传教,并做了大量的福音传播工

作。

还在川西服务区开设之初,边疆服务部就派遣了以传教人员为主的队伍。随即,边疆服务部又派张宗祺、祈玉玺两医师在威州(今汶川)创办医院,以医疗工作为手段,积极推进传教工作,服务边胞。西康区更甚,虽然边疆服务部派遣赴西康区的“第一批服务员几全系负责卫生工作者”,“但他们到西昌后,第一件工作,不是看病而是召集原有教友重新开始礼拜”<sup>⑧</sup>。西康区为有效展开传教工作,配备有多名专(兼)职宗教干部。

具体传教工作也很快开展起来。边疆服务部的宗教工作,基本上是配合在各项工作之内,目的是要使边胞在潜移默化中“明白敬神爱人的道理”<sup>⑨</sup>。从手段和方法上讲,通常是以“社教及医药为入手办法,再相机宣传耶稣基督的救恩”<sup>⑩</sup>。但在实际服务工作中,其传教之“入手办法”却灵活多样,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概言之,边疆服务部工作人员主要采用了门诊传教,家庭拜访及医院探视,巡诊传教,医护培训班的传教,电化教育及图书室传教,诗歌、故事传教等传教方式。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门诊传教及巡诊传教为例剖析边疆服务部医疗传教的方式及内涵。

### 1. 门诊传教

门诊传教是边疆服务部将医药工作与传教相结合的主要形式。川西区和西康区的医院和诊所均是为传教而设,既是医疗卫生机构,同时也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传教场所。

以威州医院为例。当第一批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到达川西区并在医院开始诊治病人的工作之后,传教工作也随之展开。据相关资料记载,威州医院“每日门诊,就医者极多,大有门庭若市、应接不暇之势”。而先前赶到的宗教人员耿笃斋、邵云亭则“在候诊室与病人相机谈道”,“极为活跃”。<sup>⑪</sup>他们“在门诊方面帮助一切,或作门诊传教,或维持病人按着次序入室就诊”<sup>⑫</sup>。牧师耿笃斋曾记述说,在威州,医药工作开始后,每日“乃留在医院门诊处照应病人,并作门诊传教”<sup>⑬</sup>。可见该院门诊传教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在杂谷脑医院,传教员王素清开展的宗教工作,除妇女识字班、青年查经班、家庭晚会、主日儿童会等形式外,还有专门为医院病人设置的医院同人灵修会,引导病人参加基督教灵修活动<sup>⑭</sup>。

西康区亦然。1944年,西康区部的第21次

干部会议曾做出决议,西昌中心医院的南街门诊部候诊室每星期六下午在该处演讲卫生常识,星期日下午则进行传教。<sup>⑮</sup>传教员冯葆光在总结西康区部1942年秋季宗教工作报告中曾谈到每星期六午后,他必亲往医院对病人布道;另一传教员邓素娥也定期探访女病人。其工作内容“除与(病人)谈心、读经、祈祷、唱诗外”,还以留声机播放各种音乐,“籍以提起病人之欢心”。<sup>⑯</sup>为了增加宗教气氛,在每一个医院内都挂有宗教图画及基督画像,医务人员在个工作间隙常利用这些图画向病人讲述耶稣真道。在医院比较忙碌而病人在旁守候之时,医务工作者还发给边胞一些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宗教之画册、图书,尤其是教会报章杂志,虽陈旧亦不计。……耶稣奇迹画片,以及其他劝世文”,“均是宣教时之急需”。<sup>⑰</sup>对成年病人发给《马可福音》、《耶稣为何而死》、《得救巧法》、《新旧约全书》等,给儿童则发给《耶稣救人的连环图》、《普天同赞》等。<sup>⑱</sup>通过这些方法,医院在治病的同时,收到了一定的传教效果。

### 2. 巡诊传教

边疆服务部传教人员除在医院、诊所从事传教外,还采用巡诊传教的方式对边民传教。在川西区,牧师耿笃斋、邵云亭初到杂谷脑时,即择选杂谷脑丹札木沟为工作的中心地点,“不时到该处讲道,巡回治疗及访问工作”,“每日过午提药包至丹札木沟,作探访工作。……(对)该沟人士及各寨领袖……简单小病,就地治疗,大症则介绍入医院”。这样,传教人员与边民“彼此情感,逐渐增厚,间对(之)谈及宗教问题及耶稣的大爱,无不肃然起敬”。并且“因治疗小病,结识朋友,因而欲谈宗教问题者,亦不在少”<sup>⑲</sup>。1941年初,耿笃斋与医生许林山一起到该地巡诊,在为边民治病施药以外,还“分送劝世文、宗教图画等品,并寻找机会与人谈道”<sup>⑳</sup>。耿笃斋还常到哥达寨、述司板、马路寨、堪木关、科多寨、重姑山、克生寨、木完寨、司务寨等地,作巡回治疗及访问工作。“一月治疗的病人,总在四五十人之多”<sup>㉑</sup>。几乎所有病人都成为其传教的对象。耿笃斋因工作勤奋和对他人的关爱而受到边民的广泛尊敬,被当地百姓称为“丹札木沟的牧师”。

西康区的巡诊传教工作亦开展得有声有色。西康区医生于子欣“每次深入夷区施医时,皆向傜胞作宣教工作”<sup>㉒</sup>。1948年3月,牧师乔普济、医生张广文及传教员张国人,经礼州、德昌等

地,历时 13 日,举行该年春季巡回施医传教活动。途中,张国人发现,由于彝人迷信鬼灵,不信任医药的效力,患病只请巫师念咒祛病,民众死亡率逐年增大。据考察,民众不信医药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该地根本没有一个诊疗所,边民无从知道医疗的效力<sup>③</sup>。而边疆服务部通过巡诊的方式将医药送上门,不但为边民施医,解决了边民的实际医药问题,而且还使边民在解除病痛的同时,接受了有关耶稣基督的宣传。

巡诊传教系在主动将医药送往穷苦边远村寨的同时,开展有关基督教的宣传。传教员除了带上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同时,还带有宣传宗教的图书、图画。在“为病人施给简单治疗和药品”时,边疆服务部人员通常要“悬起宗教图书,随机解释,以令人动容”<sup>④</sup>。这种传教方式在边寨颇受欢迎。如耿笃斋在哥达寨作巡诊传教时,寨中有一位戴姓老太太,其子在喇嘛寺作喇嘛,耿笃斋“施以药剂为之治疗心口疼症,并赠以耶稣图画一张”。戴姓老太太接受了“神圣”的耶稣图画,十分感动,“速令家人置诸高头(按:高头即楼之顶层)”,让家人顶礼膜拜<sup>⑤</sup>。

为了让边民接受耶稣基督,边疆服务部人员有时“像大刀阔斧般直接地向他们灌输真理”,但更多的时候,却是“采用启发式的发问”。传教人员与边民沟通时,“都从他们一般的需要出发……不是把他们的信仰对象铲除净尽”,而是希望边民能摆脱“巫术崇拜”的传统桎梏,接受有关耶稣基督的宣传<sup>⑥</sup>。

总之,边疆服务部人员在向边民推动卫生工作的过程中,通过灵活多样的传道方式,向边民宣传耶稣上帝,力图使之理解边疆服务部的工作,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并接受基督教。边疆服务部同工感觉到,通过医疗作为手段传教,边民中的一些人“很接近道理”<sup>⑦</sup>。一些边民因此接受洗礼,皈依耶稣基督。<sup>⑧</sup>

### 三、医疗传教工作取得的成就及不足

边疆服务部同工认为,“病人之需医师,不只在治疗,尤其在慰藉”<sup>⑨</sup>。所谓的“慰藉”,就是宗教发挥的精神与信仰的作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工作人员在给边胞治疗身体疾患的同时,均谨记其传教使命,设法激发边胞对基督教的信仰,劝导他们受洗入教。应当承认,边疆服务部以医疗卫生为手段在各服务区开展的传教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医疗传教工作使部分边民改变了对外

来宗教人员的成见。余牧人曾于 1940 年夏参加学生暑期服务团前往杂谷脑调查研究边疆教育现状、成人教育现状及“体察边疆同胞的现实生活状况”。余牧人在汶川、理县、杂谷脑等地发现“有广大的灵性荒原待开发”,认为边疆服务部在此的宗教事工是“中国教会自立自传的新发展,也是中华归主运动的大进步”<sup>⑩</sup>。川西区边民“平日不相信外来人,害怕外来人的夷羌同胞们”,但对于医疗布道人员,则“认定不是来欺骗他们而是真的来帮助他们的好人”<sup>⑪</sup>。耿笃斋等人来到自流沟、龙口寨等处时,边民乍见他们“异言异服,颇有些骇怪”,耿氏在同他们稍作晤谈后,边民即把耿氏等人“让到家中,款以清茶”,“都表示出热烈欢迎”,把他们“看作知心朋友”<sup>⑫</sup>。邵云亭在萝卜寨传教时,以“医药为入手办法,再相机宣传耶稣基督救恩”。向与其接触的人相机谈道,还“借着图画、小册、唱诗而宣传福音,希望逐渐引人归主”。“白天拜访家庭,晚上在朋友家中开会,作宗教唱歌、演讲福音、输入常识等,接连每晚都到六七十人”<sup>⑬</sup>。

其次,有部分边民应召受洗,医疗传教取得一定成效。在传教人员的引导下,杂谷脑民众李琼珍、贾凤梧、任志贞、王萍清、王述英、马玉琴、胡静英、文崇真等人“信心坚决”,耿笃斋为其施行洗礼<sup>⑭</sup>。受洗后,她们积极参与宗教活动。在她们的组织下,当地家庭礼拜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此活动轮流在教友家里举行,一方面在教友家中推行宗教,引导其家人皈依;另一方面,扩大传道范围,让多人聆听真道。于是每逢举行家庭礼拜时,教友即邀请邻友参加,藉此得到不少道友,扩大了耶稣基督的影响,壮大了杂谷脑教会力量<sup>⑮</sup>。

川西区的医疗传教的影响突出表现为该部服务人员以生命为基督教的“证道”。牧师耿笃斋及医务人员马锡山以自己的生命为基督作了见证。医生马锡山在川西医疗传教,后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马氏的经历是该部医务传道者为神所作的极好见证,在边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马逝世之后,街坊挽词中有云:“君术活人难活己,我辈埋骨岂埋名”,表达了边民对马氏的德爱。马氏殡葬之日,威州“街为之塞,涕泣声,痛苦声,火炮声,男女老幼,无不涕泪交流。据说威州建立以来,死的人不知多少,从未有如此悲惨情形者”。其中挽联“针砭失灵,汶川岷水增惨色;良医其萎,戎叟羌童动哀声”,真切表达了当地民众对马氏的敬重<sup>⑯</sup>。马氏在边地的耕

耘,促进了边民对基督教的认识,扩大了基督教在当地的影响。

西昌服务区的传教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恢复在礼堂崇拜后,在冯葆光牧师的引导下,西昌中心医院在1943年即有两位病人立志信道<sup>⑥</sup>。次年10月,西康区聘得朱晨声为宗教主任干事。到西昌后不久,朱氏发现西康区整个教会的担子压在区主任肩头上,不利于教会的发展。为了养成平民信徒的责任心,经过商讨,选曲宗礼、陈鸿铨、萧太太、刘善庭等四人为西昌中华基督教会执事,协助牧师办理教会事务。此后,西康区宗教事工有了较大发展。后有周应祥为神恩感召,来教会内“痛陈前非,啼不成声,要求收为西昌教友,按着教会仪式受洗”。西昌教会乃于次年1月为其施行洗礼,是当年“西昌教会奉献于神的初收果实”<sup>⑦</sup>。西昌城东的罗家场,是西康区部经常巡回工作的地域,该场彝胞因受该部“服务精神之感动”,“集体联名请求加入教会,并向区部献羊一匹,以示敬意”<sup>⑧</sup>。

不过客观地说,边疆服务部医疗传教的成绩并不突出。以川西区为例,该区各医院诊所每年门诊和巡诊的各类病人数以万计,但真正接受其宗教宣传,正式受洗皈依耶稣基督的却屈指可数。多数边民对其宗教事工都持怀疑态度,一些对基督教表现出兴趣的边民又往往抱有趋利避害的现实功利心理。传教员范文海主持川西区萝卜寨宗教事工时就发现,因庄稼收入少,寨上年富力强的男人和女人多为“背子”(以帮别人背东西为谋生手段的人),又害怕被军队拉夫,在他们的理念中,只要能为他们“积福免祸”,“什么神都好,愈多愈好”。这种情况使他们容易与“外来的”宗教组织接触。但也恰恰是这心理因素,构成了基督教传道的障碍。当范文海对边民讲道时,他们所关心的却是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信基督教能得多少钱?信基督教就不被拉夫了吗?信基督教是很好的教,劝人为善,庙子里供上耶稣不是更好么?先生,耶稣和庙里的菩萨不是一样么?<sup>⑨</sup>

邵云亭也遇有类似的经历。当邵氏向边民讲道时,边民纷纷打听:“投基督有什么好处,给钱不给钱?”萝卜寨保长虽积极支持边疆服务部宗教事工,“希望此地能有人投耶稣,好叫人多明白些真理,使更多麻烦的事免得发生”<sup>⑩</sup>。还是伴随着减少麻烦的现实考虑,不一定是出于信仰之需要。边地民众及社会基层控制者总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理解和利用基督教,这是医疗传教

效果不甚理想的主要原因。

医疗传教工作之所以出现不理想的状况,与边疆服务部在边疆医疗传教受到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关。该部在开展医疗传教工作的过程中,曾遭遇到很多困难。余牧人在杂谷脑和汶川调查时,认为开展川西教会工作主要有列困难:传道太人太少,有能力的传道人更少;羌戎二族都有他们的宗教信仰,尤其戎人对喇嘛教的信仰,根深蒂固,不易动摇;1934年的洪水和1935年的内战,给了传教工作很大的损害;以往收纳教友太随便,教会多不健全;派往边区的传道人待遇太低,力量太薄,又无文化食粮的供给,使传教人员容易灰心等<sup>⑪</sup>。余氏所言极好地概括了在川康边地医疗传教的艰辛。

不过所有这些原因均非根本性的。从根本上言,边疆服务部医疗传教能否成功涉及到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既有的民族文化与宗教同外来宗教的关系问题,涉及到能否或应不应该用基督教来取代或改造边地少数民族既有的文化与宗教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限于篇幅,只得另文再述。

(责任编辑:甘棠)

\* 本文为作者承担的教育部2011年规划基金项目《基督教与川康地区文化的冲突与调适研究: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川康的活动为例》(批准号:11YJA730002)及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抗战时期基督教对川康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以边疆服务运动为个案进行考察》的阶段成果。

- ① 涉及基督教医疗传教的近期论作主要有:杨天宏:《中华基督教会川、康边地的宗教活动》,《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陈雁:《清末民初传教士“医学传播”的方式与影响》,《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江莉:《从〈华西教会新闻〉看近代四川基督教医疗事业》,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拙文《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西医业的兴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也论及了基督教对川康西医业兴起的促进作用。
- ② 《圣经》中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耶稣传教时给人治病的记录。
- ③ 海珥玛著、何慈洪译:《基督教会的乡村工作》,广学会出版,1939年,第1页。
- ④ 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4—295页。
- ⑤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8页。
- ⑥ 参见Dr. R. E. Hoffman, *Journal of the Christian Medical Assoc. of India, Burma and Ceylon, Efficiency in the Task of Medical Missions*, Jan. 1940. 转引自海珥玛著、何慈洪译:《基督教会的乡村工作》,广学会出版,1939年,第3—

- 4 页。
- ⑦ 崔德润：《川西边地之新气象》，《边疆服务》第 5 期，1944 年 2 月，第 13 页。
- ⑧ 参阅邓杰：《李安宅与边疆服务运动》，《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 年第 6 期。
- ⑨ 海秋：《四川西北区概况》，《边疆服务》第 26 期，1948 年 9、10 月，第 8 页。
- ⑩ 参见《西行见闻记》，《公报》第 12 卷第 6 期，1940 年 6 月 1 日，第 1—6 页。
- ⑪ 老成：《横越大凉山》，《边疆服务》第 15 期，1947 年 3 月，第 13 页。
- ⑫ 李应三：《对普雄剿夷善后的几点意见》，《边疆服务》第 17 期，1947 年 5 月，第 9 页。
- ⑬ 《川西区工作报告》，见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第五届年会议记录》，全宗号 51，目录号 4，案卷号 251。
- ⑭ 崔锡章：《开会词》，《边疆服务》第 4 期，1943 年 11 月，第 1—2 页。
- ⑮ 李万方：《谈本部为宁属边民服务》，《边疆服务》第 4 期，1943 年 11 月，第 2 页。
- ⑯ 张伯怀：《本部的回顾与瞻望（闭会词）》，《边疆服务》第 4 期，1943 年 11 月，第 7—8 页。
- ⑰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第五届总会议记录》，第 24—25 页，编号 U102—0—16。
- ⑱ 《西昌教会的呼声》，《田家半月报》第 8 卷，第 15、16 合刊，第 15 页。
- ⑲ 李士达《复毛士洵先生书》，《边疆服务通讯》第 9 期，1946 年 10 月，第 29 页。
- ⑳ 《川西威州宗教事工续讯》，《公报》第 13 卷第 12 期，1941 年 12 月 1 日，第 7 页。
- ㉑ 《边疆服务之川西消息》，《公报》第 12 卷第 9 期，1940 年 9 月 1 日，第 9 页。
- ㉒ 《边民宣教近况》，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宣教事工同年工会时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报专号），第 18 页，编号 U102—0—27。
- ㉓ 耿笃斋：《边疆服务通讯》，《田家半月报》第 7 卷，第 14 期，1940 年 7 月 16 日，第 9 页。
- ㉔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西南宣教通讯》第 1 期，1950 年 12 月 1 日。
- ㉕ 《第二十一次干部会议纪录》（1944 年 8 月 18 日于西康区部会议室召开），凉山州档案馆馆藏档案：《边疆服务部西康区三十五年会议记录及总部来信登记》，全宗号 317，案卷号 35。
- ㉖ 冯葆光：《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西康区部一九四二年秋季之宗教工作报告》，《公报》第 14 卷第 7、8、9、10 期合刊，1942 年（无月份），第 35—36 页。
- ㉗ 《边民宣教近况》，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宣教事工同年工会时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报专号），第 20 页，编号 U102—0—27。
- ㉘ 西昌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共西康省委西昌地委关于宗教、民族工作的意见、报告、总结》，全宗号：11，目录号 1，案卷号 48。
- ㉙ 《边民宣教近况》，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宣教事工同年工会时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报专号），第 19 页，编号 U102—0—27。
- ㉚ 《川西杂谷脑宗教事工续讯》，《公报》第 13 卷第 2 期，1941 年 2 月 1 日，第 10 页。
- ㉛ 《边民宣教近况》，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宣教事工同年工会时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报专号），第 20 页，编号 U102—0—27。
- ㉜ 冯葆光：《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西康区部一九四二年秋季之宗教工作报告》，《公报》第 14 卷第 7、8、9、10 期合刊，1942 年（无月份），第 35—36 页。
- ㉝ 张国入：《巡回归来话观感》，《边疆服务》第 25 期，1948 年 7、8 月，第 16 页。
- ㉞ 《川西杂谷脑宗教事工续讯》，《公报》第 13 卷第 4 期，1941 年 4 月 1 日，第 11 页。
- ㉟ 《边民宣教近况》，见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宣教事工同年工会时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报专号），第 20 页，编号 U102—0—27。
- ㊱ 伍明乐：《我们对罗布工作的意见和展望》，《边疆服务》第 9 期，1945 年 10 月，第 20—21 页。基督教传教人员向边民介绍的有关基督教的内容主要有：（一）耶稣的主要教训；（二）基督教的主要使命；（三）基督徒的特色，包括倡导惟一真神，实行一夫一妻制，不赌博，不吸食鸦片烟，不醉酒，爱邻舍等等。
- ㊲ 王禾章：《昭觉之行》，《边疆服务》第 27 期，1948 年 11、12 月份，第 8—9 页。
- ㊳ 以耿笃斋开展的传教工作为例。经过努力，他“招抚旧教友，又传播新种子”，使杂谷脑“气象为之一新”，在其传教期间，“陆续受洗者十余人”。收到了一定的传教成效。《一年大事记》，《边疆服务》第 1 期，1943 年 4 月，第 23 页。
- ㊴ 王贯三：《我对于马锡山医师的认识》，《公报》1947 年 11 月，第 7 页。
- ㊵ 余牧人：《成都到扎谷脑》（续），《田家半月报》第 7 卷第 23 期，1940 年 12 月 1 日，第 8 页。
- ㊶ 《教会消息：边疆服务部川西区工作紧张》，《田家半月报》第 7 卷第 7 期，1940 年 4 月 1 日，第 6 页。
- ㊷ 耿笃斋：《边疆服务通讯》，《田家半月报》第 7 卷第 14 期，1940 年 7 月 16 日，第 9 页。
- ㊸ 《川西威州宗教事工续讯》，《公报》第 13 卷第 11 期，1941 年 11 月 1 日，第 11 页。
- ㊹ 《川西杂谷脑宗教事工续讯》，《公报》第 13 卷第 4 期，1941 年 4 月 1 日，第 11 页。
- ㊺ 《川西杂谷脑宗教事工续讯》，《公报》第 13 卷第 5 期，1941 年 5 月 1 日，第 6—7 页。
- ㊻ 王贯三：《我对于马锡山医师的认识》，《公报》，无卷号，1947 年 11 月，第 7 页。
- ㊼ “一位熊志远，原籍安徽人。剿夷受伤，住院调治，因受神感动，立志信道，并已捐国币贰拾元为添置礼拜堂凳子之用。另一位高文武，河南洛阳人，住院治眼疾，已立志信道。出院后决定作礼拜。”《西昌教会另有新枝》，《公报》第 15 卷第 1、2 期合刊，1943 年 2 月 15 日，第 31 页。
- ㊽ 朱晨声：《边疆服务部西康区宗教工作概况》，《公报》第 17 卷第 1 期，1945 年 4 月，第 18—19 页。
- ㊾ 《边疆服务简讯》，《边疆服务》第 2 期，1943 年 6 月，第 24 页。
- ㊿ 范文海：《信基督教》，《田家半月报》第 11 卷第 3、4 期合刊，1944 年 2 月 1 日，第 19—20 页。
- ① 《川西威州宗教事工续讯》，《公报》第 13 卷第 12 期，1941 年 12 月 1 日，第 7 页。
- ② 余牧人：《教会在川西的传教工作》，《公报》第 13 卷第 5 期，1941 年 5 月 1 日，第 4—5 页。